



2000-2002年华人传播学研究：大陆以外地区（下）

时间：2003-8-1 9:20:41 来源：中国新闻研究中心 作者：陈国明 阅读6680次

- 2000-2002年华人传播学...
- 2000-2002年华人传播学...
- 2001—2002年中国传播...
- 2001—2002年中国传播...

二、研究方法和典范的取向

以传播学六大领域为基准，分析台湾、港澳、与海外华人的传播研究内容，得以窥知台湾传播学的研究，一向以新闻与媒体为主轴，直到近几年来才慢慢有学者走入Speech Communication领域的研究。港澳与海外华裔传播学者虽起步较晚，但比较能够兼顾到传播的各个领域。不过，由于ACCS, CCA, 与CCS会员的重叠，以及学术活动交往频繁，联合起来审视，大陆之外地区华人社会传播学的发展，应属在正轨内前进。

除了以传播学六大领域做为分析的基准之外，从研究的内容，我们也同时可以审查传播学研究方法的取向，以及典范 (paradigm) 的变迁。由于ACCS 与CCA都成立在一九九〇年之后，其成员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与依据的研究典范，基本上与台湾同期的发展一致。因此，就以台湾地区的发展作为讨论的基础。依据林丽云的分析，一九五〇与六〇年代，台湾的传播学研究典范，属于军事主义影响下的‘政治控制典范’，以宣传为主体，以美国行为主义的传播研究为依归。一九七〇与八〇年代，以‘发展理论’为研究典范的依据，侧重在阅听人、大众传播过程与民众反应、以及媒介体系的表现为研究的主要反向。‘批判理论’的典范则在八〇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一九九〇年之后为自由化之下的‘多元典范’时期。行为主义的实证论，文化研究的批评论，以及解释等不同典范并存共生，呈现百家争鸣的蓬勃气象。‘多元典范’的现象，在ACCS 与CCA成立之后，即是会员研究的取向[24]。

总结而言，传播学的‘多元典范’，其实是指‘发现典范’ (discovery paradigm)、‘解释典范’ (interpretive paradigm)、以及‘批判典范’ (critical paradigm) 三大种类。对典范的信仰，更直接关系到研究方法的使用。

‘发现典范’认为一个可知的‘实体’ (reality) 存在着，以待人们去发现。这个典范的哲学思想，建立在理性主义、实证主义、逻辑实证论、行为主义、以及现代主义等认识论 (epistemology) 的基础之上。其研究的目的在于正确地表现出实体，因此特别注重严谨、有系统、与可以重复性研究的过程。为了正确地掌握到实体的再现，对研究对象的归类 (classify) 与普遍性通则 (rules) 或律则 (laws) 的确认，乃成了必要的手段。在传播学领域，‘发现典范’常用的研究方法，包括了调查法、网路分析 (network analysis)、内容分析、互动分析 (interaction analysis)、新亚里斯多德语艺批评 (new-Aristotelian rhetorical criticism)、与古典类型语艺批评 (classical genre rhetorical criticism) 等。

‘解释典范’认为多重实体经由社交建构 (socially constructed) 存在着。这个典范的哲学思想，建立在解释学 (Hermeneutics)、现象学、符号互动 (symbolic interaction)、建构主

义(constructivism)、与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的基础上。其研究的目的在于了解意义(meaning)是如何创造的，因此强调解释过程的创造性与价值观。为了了解意义，从参与者与其所处环境的角度来加以描述，乃成了必要的手段。在传播学领域，‘解释典范’常用的研究方法，包括了民族志学(ethnography)、交谈分析(conversational analysis)、言说分析(discourse analysis)、象征语艺批评(metaphoric rhetorical criticism)、幻想主题分析(fantasy theme analysis)、与叙述语艺批评(narrative rhetorical criticism)等。

‘批判典范’也认为多重实体经由社交建构存在着。这个典范的哲学思想，建立在批判理论(critical thoery)、解构主义(deconstructivism)、符号学(semiotics)、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与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的基础上。其研究的目的在于显现事件的隐藏结构(hidden structure)与促进社会的变化(social change)。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凸显或确认出，尤其是被压迫者，历史与文化背景下的隐藏结构，便成了必要的手段。在传播学领域，‘批判典范’常用的研究方法，包括了批判民族志学(critical ethnography)、马克思批判主义(Marxist criticism)、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后现代批判主义(post-modern criticism)、后现代批判主义(post-modern criticism)、后结构批判主义(post-structural criticism)、与后殖民批判主义(post-colonial criticism)等。

以传播学六大领域，分析大陆之外华人传播学研究的内容，虽然发现台湾与港澳地区，仍然偏重于大众传播这个领域，但是从典范与研究方法取向的角度来审查，却可喜地发现百花齐放的多元色彩。而且这个多元的取向的潮流，在ACCS, CCA, , 以及CCS会员的研究，仍如火如荼持续的开展着。例如，CCS的期刊《中华传播学刊》二〇〇二年的创刊号，就是以〈传播学的众声喧哗〉做为该期的专题。这对整个华人社会传播学研究与教育的未来发展，具有很正面的价值与帮助。

伍、未来的展望

ACCS, CCA, 与CCS三个组织，代表了台湾、港澳、与其他非大陆地区的海外华人传播学研究的面貌，它们如同鼎之三足，维系着华人社会传播学的前途。因此，这三个学会在良性竞争下，能分享研究与教育心得，并进一步与大陆学者携手合作，共创一个具有系统性的学术资源，乃是整个大中华传播学生命持续的主要依靠。

三个学会之间的合作，自从五年前就已开始尝试。譬如，ACCS与CCA从一九九八年起，已连续参与CCS每年的年会。特别是三个学会合组的讨论会，给会员之间带来了针对当代华人传播学研究的主要问题互相对话的机会。这种策略性的合作，无疑地拓展了华人传播学研究的时空界域，给华人传播学研究的未来，描绘出一幅乐观的景象。

以整体的观点展望华人传播学未来的发展，除了持续这三个华人传播学会正常的互动与互助之外，更需要了解如何共同因应整个时代潮流的变化与冲击。以便凝聚出一个具有文化认同与特色的华人传播学研究与教育，并进一步与全球化的潮流结合，为整个传播学与人类社会提供必要的贡献。

首先，在巩固华人传播学会合作的基础方面，除了建立在它们都是为华人社会服务的共同性之外，更应该建立在它们之间的独特性。这个独特性，筑基在每个学会于专业研究上不同的侧重，也就是上述所谈到的新闻学、大众传播学、与演辩传播学等领域的轻重之别。然后经策略性的联盟，由各个学会联合起来，共创一个整合性的具有华人文化特色的传播学体系。这种合作性的联盟，要求学会成员必须具有一个开放的心胸与长远博大的眼光。换句话说，这些学会必须能够把传播学研究扎根在中华文化的土壤，然后一起凝聚出共同的语言与心声，投射到全球的脉络。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华人传播学会，有必要拟定一个简单清晰的任务声明。依我见，此声明应阐述华人传播学研究与教育的目的，乃在于连系、互助、与成长；其价值观乃建立在激励

动机、促进和谐、与推动教育三项概念的重视与落实。更具体而言，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华人传播学会的联合，必须能够达成四项要素：(1)开拓一个全球性的视野，(2)培养足够的知识与技术以均衡全球化潮流所产生的矛盾，(3)培养足够的弹性能力以在个人与组织层次，经营全球化潮流所带来的巨大变动，以及(4)培养敏锐与开放的能力来尊重多元化以不断的改进[25]。

在达到建立一个具有文化认同与特色的华人传播学研究与教育体系，并延伸到与全球化的潮流结合的理想之前，我们有必要更清楚地从传播学的面向，来了解‘全球化’(globalization)这个概念。毋庸置疑地，当今时代正处于巨变之中，尤其是全球化的浪潮正一波波地冲击着人类社会。传播与交通科技已大大缩小了整个地球和世界的范畴，人类已无法避免地生活在全球化的社会里。从华人传播学未来发展的角度而言，面对着全球化浪潮冲击之时，应该注重三大主题的探讨，才能同时达到内在凝聚出自我文化特色与外在延伸以贡献全球化社会的目标：(1)全球化社区认同的延续与变迁，(2)全球化媒体的兴起与冲击，以及(3)全球化社会里人类沟通的本质与形式[26]。

首先，全球化社会的形成，并不意谓着一个新的社区意识会跟着降临。要达到一个理想的全球化公民社会，我们必须经由学习来建立新的社区意识。换句话说，建立新的社区意识如同栽培芳草卉一样，须要细心的照顾与调养。全球化社区要求以包容性来焊接不同种族、文化、宗教、性别之间的隙缝，并同时要求所有份子共同投入全球化社会的建设。在这个社区里，成员间寻求共识与交感，试着以一种喜乐与感恩心情，经由沟通对话，发展出所谓的‘沟通实境’(communication realities)，来自由陈述表达各种思想、论点、信仰、喜怒、与善恶[27]。由此我们可以察觉沟通在建立全球化社区意识的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因此，华人传播学者有义务共同审查沟通对社区意识形成和全球化社会的降临之间所存在的可能关系。另外，由于全球化社会代表着一个整合了多种不同文化的世界，市民除了归属于一组自己认同的文化，免不了得同时参涉几种不同的文化系统。因此，如何教育个人经由沟通的过程，在多元文化的社会里谈判交涉与共创文化认同意识，便成了一项华人传播学教育极其重要的主题。也就是华人传播学者不仅要研究文化的多元性给全球化社会带来的冲击，本土化和全球化之间的拉拒，更需进一步共同从传播沟通学的角度，研审文化认同与文化多元之间的辩证关系。

第二，全球化社会因传播媒体的兴起而兴起，也可能因传播媒体的幻灭而幻灭。例如，传播媒体所制造的虚拟环境，不仅提供全球化社会成员之间相互连系的功能，而且在政治行使的过程，也扮演了一个决定性的角色。媒体创造了一个有关全球化社区诸问题皆可付之讨论与辩论的‘公共空间’(public sphere)，它们引导了市民参与全球化社区的生活，更以其快速与无远弗届的资讯传递，推动多元文化在全球化社会里相互沟通了解的潜力，给人类呈现了一幅新的远景[28]。可惜的是，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媒体同时也一步一步深化了它的商业化、商品化、与彼此竞争的特色。受制于广告商的媒体商业化模式的意识形态，很可能颠覆民主的程式与逐渐毁损得之不易的公共空间。毫无疑问地，媒体如何发挥其功能，以保存固有之政治文化空间与调解来自地方与国家的对抗，将决定全球化社会未来的前途。因此，华人传播学者当责无旁贷，共同戮力探讨全球化媒体兴起沿革，媒体与全球化社会兴起的互证关系，全球化媒体和人类相互了解的关系，网际网路对全球化社会的冲击，和全球化媒体所演生的道德责任等媒体与全球化社会的互动关系。

最后，全球化潮流既然把个人与个人，组织与组织，和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提升到前所未有的紧密程度，如何协助社会成员获取了解、尊重、与容忍文化差异的知识与技术，达到和平共存、共生的境界，便成了华人传播学者无法逃避的共同任务。这正意谓着了解全球化社会里人类沟通的本质与形式的重要性。那么，华人传播学者应如何共同来协助全球化社会的成员成就人类沟通的善境呢？重点在于从四个方向[29]，培养出人本的特质。第一是培养成员开放的心灵，来面对与接受新潮流的激荡与多元文化所带来的复杂性、不确定性、矛盾性、与各种冲突。唯有开放的心灵，在面对文化差异的冲击时能够以一种整合性的能力求变、求新。二是培养成员提升自我的能力。提升自我就是经由不断的净化，开发潜力，把自己全然解放，在

全球化社会里，突破自我限制，成就一个美满人生的过程。三是培养描绘文化的能力。这种正确地认知自己与他人文化之异同的能力，是增进不同文化与族裔背景人物，在全球化社会里互动之了解，与舒缓因多元文化的模糊与不确定性所产生的焦虑感的良方。经由迷惑、挫折、分析、与融入等步骤，吾人的认知系统，能协助我们达到分辨双方文化的知识与特质，并进一步描绘出一幅可资理解的文化图案。唯有经过这个感情投入的主动性的学习与认识过程，我们才有办法发展出一个能够尊重、容忍、与接受文化差异的态度。最后是培养人际沟通的技巧，来润滑与调理互动的过程。唯有成功地把心智、情感、与认知的能力，与行为层次的沟通技巧整合起来，我们才有办法成功地在全球化的社会里，活出生命的意义与价值。这些诸如口语与非口语之能力、行为弹性、与互动经营等调理沟通的能力，正是传播学系最基本，但在华人社会极待加强传授的科目。

总之，华人传播学未来的展望，必须建立在海内外对华人传播学研究有兴趣之学者与学会组织之间的同心协力，对内重新寻求具有中华文化共识之认同，并以此为基础，展现出一个开放的心灵与视野，充份的知识与技术，娴熟的弹性沟通能力，与尊重多元化之异同的胸襟，把华人文化的认同感，投射到全球化社会的脉络里。唯有这种内外兼顾的追求，才能显现出华人传播学的特色与价值；也唯有如此，整个华人传播学界，才有可能打造出一个光明的未来。

陆、结论

人类社会走向全球化是一股无法阻挡的潮流。传播与交通科技革命已将文化与国家之间的界限逐渐泯除。二十一世纪的来临，意谓着旧社会形态的消失与一个崭新的心理与人类生活方式的产生。针对这种毫无选择余地的巨变，比起其它科系，传播学这个领域，更需要肩负起协助人们适应未来社会的责任。

本文针对这个主旨，探讨大陆之外华人地区传播学研究三年来的发展，并进一步提出对海内外华人社会未来传播学发展的建议。首先以树为喻，界定了传播学的主干与六大枝干，并以此分析台湾、港澳、与海外华人传播学研究的内涵。接着介绍了目前华人传播学研究的三个学会，包括ACCS, CCA, 与CCS，并对这些学会成员三年来的研究，做了一个概括性的分析，以对整个华人传播学研究的全貌，有个大致上的了解。最后，本文提出整合海内外华人传播学研究在全球化社会里的重要性与延续性，并提出几个可遵循的方针。唯有经由健全的本土性的发展与认同，再以此认同投射到整个全球社会，华人传播学才能显现其光辉与乐观的前景。

An Examination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 Taiwan, Hong

Kong, Macao, and Overseas Chinese Societies

Chen Guo-ming

(University of Rhode Island, Kingston, Rhode Island, USA.)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amine Chinese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 the areas of Taiwan, Hong Kong, Macao, and overseas, and further propose a direction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 Chinese societies. First, the author uses a tree as a metaphor to define the field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The communication tree is then used to analyze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 the above areas. Second, the author separately examines the history and research of the three well-established Chinese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s, including ACCS, CCA, and CCS, that together can reflect a picture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 the above areas. Lastly, the paper argues that under the impact of globalization, it is necessary for domestic and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cation scholars and associations to cooperate and integrate their efforts.

in order to survive and make contributions to the global society.

Key words: CCA; ACCS; CCS; Definition of Communication Discipline; Globalization
【HT5SS】

[1]本文原版发表在《新闻学研究》第六十九期(2001, 页1-28)。感谢《新闻学研究》允许本人转载、修正、与添增三年来研究的新资料。

[2]黄金贵(1997): 《古代中文化中的传播概念》, 孙旭培编, 《华夏传播论》。北京, 人民出版社

陈国明(2002): 《华人传播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中国传媒报告》, 2

Chen, G. M. (2000, November). Problems and prospect of Chinese communication stud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Seattle, Washington.

[3]秦志希(1997): 《中国传统文化中传播的若干特性》, 孙旭培编, 《华夏传播论》。北京, 人民出版社

[4]吴东权(1991): 《先秦的口语传播》。台北: 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

[5]陈国明(1999): 《传播学研究概观》, 《新闻学研究》, 58:257-268

[6] Delia, J. G. (1987).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 history. In C. R. Berger and S. H. Chaffee (Eds.), Handbook of communication science (pp. 20-98). Beverly Hills, CA: Sage.

[7]陈世敏(2001): 《半世纪台湾传播学书籍出版》, 《新闻学研究》, 60:1-24

[8]陈国明(2002): 《简明传播学辞典》, 台北: 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9] Rich, A. (1974). Interracial communication. New York: Harper & Row.

[10] Chen, G. M., & Starosta, W. J. (1998). Foundations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Needham Heights, MA: Allyn & Bacon.

[11]陈国明(1999): 《华人传播教育前瞻》, 《新闻学研究》, 59:179-181

[12] CCA 与ACCS并无正式的中文译名。本文使用的CCA译名, 乃是询问该组织几位会长后, 由作者译成, 因此并不代表该组织的正式译名。ACCS的译名则取自京士顿(1991)在《新闻镜周刊》的报导。

[13]京士顿(1991): 《冲突研讨会应有尽有》, 《新闻镜周刊》, 162:3

京士顿(1991): 《华人传播研究学会正式成立》, 《新闻镜周刊》, 163:39

郝洛威(1991): 《纯中国角度研究传播: 台湾学者匹兹堡广获好评》, 《新闻镜周刊》, 132:6-7

郝洛威(1991): 《华人传播学者集结筹组亚洲传播学会》, 《新闻镜周刊》, 138:22-23

[14]陈国明(2003): 《文化间传播学》。台北: 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陈国明(2002): 《简明英汉传播学辞典》。台北: 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陈国明(forthcoming): 《中华传播理论与原则》。台北: 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黄铃媚(2001): 《谈判与协商》。台北: 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萧小穗(2002): 《传媒批评: 揭开公正中立的面纱》,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Chen, G. M. (Ed.) (2000). Chinese conflict management in intercultural context. A special issue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Chen, G. M. (Ed.) (2002).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An East Asian Perspective. A special issue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Chen, G. M., & Ma, R. (2002). Chinese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resolution. Westport, CT: Greenwood.

Chen, G. M., & Mike, Y. (Ed.) (in press). Asian Approaches to Human Communication. A special issue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Chen, G. M., & Starosta, W. J. (Eds.) (2000). Communication and global society. New York: Peter Lang.

Chen, L., & Pan, S. (Ed.) (2002). Different Perspectives and Many Voice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the World. A special issue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Heisey, D. R. (Ed.) (2000). Chinese Perspectives in Rhetoric and Communication. Stamford, CN: Ablex.

Jia, W. (2001). The Remaking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 and Identity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Chinese Face Practice. Westprt, CT: Ablex.

Jia, W., Heisey, R., & Lu, L. (2002). Chinese communication Theory and Research: Reflections, New Frontiers, and New Directions. Westprt, CT: Ablex.

Lu, L., Jia, W., & Heisey, R. (2001). Chinese Communication Studies: Contexts and Comparisons. Westprt, CT: Ablex.

Chong, H. K., & Kluver, R. (forthcoming). Asia Encounters the Internet. New York: Routledge.

[15] 黄铃媚(2001):《谈判与协商》。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Chen, G. M. (1998). A Chinese model of human relationship development. In B. L. Hoffer and H. H. Koo (Eds.),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East and West in the 90's (pp. 45-53). San Antonio, TX: Institute for Cross-Cultural Research.

Chen, G. M. (2001). Towards transcultural understanding: A harmony theory of Chinese communication. In V. H. Milhouse, M. K. Asante, and P. O. Nwosu (Eds.), Transculture: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cross-cultural relations (pp. 55-70). Thousand Oaks, CA: Sage.

Chen, G. M., & Chung, J. (1994). The impact of Confucianism on 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42: 93-105.

Chen, G. M., & Chung, J. (1996). The five Asian dragons: Management behaviors and 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 In L. A. Samovar and R. E. Porter (Ed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 reader*. Belmont, CA: Wadsworth. Chen, G. M., & Starosta, W. J. (1998). Foundations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Needham Heights, MA: Allyn & Bacon.

Chen, G. M., & Zhong, M. (2000). Dimensions of Chinese compliance-gaining strategies. *Human Communication*, 3: 97-109.

Chung, J., & Busby, R. (2002). Naming strategies for 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 The chi-shih approach.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11, 77-

Crawford, L. (1996). Everyday Tao: Conversation and contemplation. *Communication Studies*, 47: 25–34.

Crawford, L. (1997). Conflict and Tao. *The Howard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s*, 8: 357–370.

Crawford, L. (2000, November).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nd Tao.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Seattle, Washington.

Lu, X. (1998). Rhetoric in ancient China: Fifth to third century B.C.E.: A comparison with classical Greek rhetoric.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Huang, L. (2000). The Chinese way of requesting information in intercultural negotiatio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9, 108–127.

Huang, L. (2002). Her talks in conflict management: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Chinese women's negotiating behavior. In G. M. Chen & R. Ma (Eds.), *Chinese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resolution* (pp. 297–316). Westport, CT: Greenwood.

[16] 朱立(1995), 《开辟中国传播研究的第四战场》, 《报学》, 6(1): 20–27

汪琪、沈清松、罗文辉(2002)。《华人传播理论: 从头打造或逐步融合?》, 《新闻学研究》, 70: 1–15

祝建华(2001), 《中文传播研究之理论化与本土化: 以受众及媒介效果整合理论为例》, 《新闻学研究》, 68: 1–22

陈世敏(2001), 《半世纪台湾传播学的书籍出版》, 《新闻学研究》, 67: 1–24

陈韬文(2000), 《理论是本土研究与国际学术的纽带》, 《传播学研究简讯》, 22: 1–3

翁秀琪(2001), 《台湾传播教育的回顾与愿景》, 《新闻学研究》, 69: 29–54

[17] Chang, H. C., & Holt, G. R. (1993). The concept of yuan and Chines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In S. Ting-Toomey, & F. Korzenny (Eds.), *Cross-cultural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pp. 28–57). Newbury Park, CA: Sage.

Chen, G. M. (1996, November). Feng shui: The Chinese art of space arrangemen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San Diego, California.

Chen, G. M., & Chung, J. (2002). Superiority and seniority: A case analysis of decision-making in a Taiwanese religious group.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11, 41–56.

Chen, G. M., & Zhong, M. (2000). Dimensions of Chinese compliance-gaining strategies. *Human Communication*, 3: 97–109.

Chung, J. (1997). Avoiding a "Bull Moose" rebellion: Particularistic ties, seniority, and third-party mediation. In A. Gonzalez, & D. V. Tanno (Eds.), Politics,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 (pp. 166–185). Thousand Oaks, CA: Sage.

Jia, W. (1997–1998). Facework as a Chinese conflict-preventative mechanism? cultural\discourse analysi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7: 53–62.

Jia, W. (2001). The Remaking of Chinese Character and Identity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Chinese Face Practices. Westport, CT: Ablex/Greenwood

Ma, R. (1992). The role of unofficial intermediaries in interpersonal conflicts in the Chinese culture.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40: 269–278.

Ma, R. (2000). "Both-and" and "neither-nor": My intercultural experience. In M. W. Lustig, & J. Koester (Eds.), *Among US: Essays on identity, belonging, and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pp. 100–106). New York: Longman.

[18] Chen, G. M. (Ed.) (1997–8). Chinese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resolution. A special issue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Chen, G. M. (Ed.) (2000). Chinese conflict management in intercultural context. A special issue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Chen, G. M., & Ma, R. (Ed.) (2002). Chinese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resolution. Westport, CT: Greenwood/Ablex. Chen,

[19] Chen, G. M. (2000, November). Problems and prospect of Chinese communication stud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Seattle, Washington.

Chen, H. (1998, November). Dependency theory revisited: Western influences on advertising in Chin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San Diego, California.

Dong, Q. (1998, November).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thinkers on theory building in 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San Diego, California.

Sun, Z. (1998, November).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 China: The state of the ar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San Diego, California.

Yang, C. C. (2000, November).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Taiwan: A meta-analysis of major journals, theses, dissertation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Seattle, Washington.

[20] Chen, G. M. (1993, November). Teaching Speech Communication with a foreign accent: A pilot stud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Miami, Florida.

Lum, C. M. K. (1996). In search of a voice: Karaok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 in Chinese America.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Ma, R. (1993, November). Communication differences between instructors who speak American-English as their first language and other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Miami, Florida

Sun, W., & Chen, G. M. (1999). Dimensions of difficulties Mainland Chinese students encounter in the United State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9: 19-30.

Wang, M. (1993, November). A fish out of water: An Asian communication professor in the American classroom.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Miami, Florida.

[21] Chang, S. (1993, November). Detailing the epiphanic moments in an introductory public speaking course: Self-reflection by a Chinese female teaching.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Miami, Florida.

Chen, L. (1993, November). Role conflicts: Female Chinese teachers in U.S. classroom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Miami, Florida.

Wang, M. (1993, November). Turning barriers into resources: A Chinese female instructor pursuit of effective teaching in the American contex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Miami, Florida.

Wang, S. (1993, November). Southern hospitality in the class: Cultural parallels and intercultural interac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Miami, Florida.

[22] Lee, W. S. (1998). Patriotic breeders or colonized converts: A postcolonial feminist approach to antifootbinding discourse in China. In D. V. Tanno, & A. Gonzalez (Eds.), *Communication and identity across cultures* (pp. 11-33). Thousand Oaks, CA: Sage.

Lee, W. S. (1998). In the names of Chinese women.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84, 283-302.

[23] Xiao, X. (1995). China encounters Darwinism: A case of intercultural rhetoric.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81: 83-99.

Xiao, X. (1996). From the hierarchical ren to egalitarianism: A case study of cross-cultural rhetorical media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82: 38-54

Xiao, X. (1997, July). The Chinese organic views and a rhetorical mission to liberate the mind.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1th Biennial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History of Rhetoric, Saskatoon.

Xiao, X. (2000). Sun Yat-Sen's rhetoric of cultural nationalism. D. R. Heisey

[24] 林丽云(2002), 《依附下的成长? 台湾传播研究典范的更叠兴替》, 《中华传播学刊》, 1: 103–137

[25] 陈国明(2000), 《全球化与本土化》, 《传播学研究简讯》, 23: 19–21

Chen, G. M. (1998). Chinese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s in the global context. CCA News, 8: 4 & 9.

[26] Chen, G. M., & Starosta, W. J. (2000). Communication and global society: An introduction. In G. M Chen & W. J. Starosta (Eds.), Communication and global society (pp. 1–16). New York: Peter Lang.

[27] Thayer, L. (1987). On communication. Norwood, NJ: Ablex.

[28] Herman, E. S., & McChesney, R. W. (1997). The global media. London: Cassell

[29] 陈国明(2001), 《回归人本的传播学教育》, 《传播学研究简讯》, 25: 15–17

[作者介绍] 陈国明, 美国罗德岛大学传播学系教授。

文章管理: wujiang (共计 687 篇)

CDDC刊载文章仅为学习研究, 转载CDDC原创文章请注明出处!

相关文章: 传播学

- 读《传播学史: 一种传记式的方法》 (2007-7-18)
- 社会语言学方法与新闻传播学 (2007-3-28)
- 论传播学研究的实证主义传统 (2007-3-8)
- 诸子百家文献的传播学视角研究 (2006-11-1)
- 政治学对经验主义传播学的影响 (2006-8-22)

>>更多

2000-2002年华人传播学研究: 大陆以外地区 (下) 会员评论[共 0 篇]

我要评论

会员名: 密 码:

关于CDDC◆联系CDDC ◆投稿信箱◆ 会员注册◆版权声明◆ 隐私条款◆网站律师◆CDDC服务◆技术支持

对CDDC有任何建议、意见或投诉, 请点[这里](#)在线提交!

◆MSC Status Organization◆中国新闻研究中心◆版权所有◆不得转载◆Copyright © 2001--2009 www.cddc.net
未经授权禁止转载、摘编、复制或建立镜像. 如有违反, 追究法律责任.